

管理研究中的“中国元素”：从情境到理论

——兼评李家涛《从中国元素到全球管理理论——中国管理研究回顾与展望》

□ 魏 江 陈光沛

摘 要：战略管理领域著名学者李家涛教授是最早一批来自中国并在国际上取得杰出声誉的学者之一，在中国学者于国际顶尖刊物发表论文三十周年之际，他撰文分享了关于中国管理研究的思考。我们认真阅读了李家涛教授的文章，认为中国管理研究要想打破桎梏，必须向国际管理学界贡献真正有中国经验和东方智慧的知识与洞见，做好中国情境与中国元素的具象与结构化，开发和完善中国本土管理理论。我们还认为，李家涛教授在这篇文章中所抛出的诸多观点和命题，如果得到适当回应，将有助于提升中国学者在主流管理领域的话语权，促进管理与组织科学的进化。同时，本文对李家涛教授提出的“中国元素”研究框架和学术倡议进行了补充和延伸。

关键词：中国情境；本土理论；制度；创新追赶

中国作为后发国家，用短短四十年的时间，在社会、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了被称之为“跨越式”的突破，被西方学者视作一个“奇迹”。我们认为，西方之所以称之为“中国奇迹”，有两层含义，一层是经济崛起出乎西方意料，另一层是西方怎么也想不明白非他们认为的市场经济国家的中国，怎么能取得如此成就。之前，西方学者用“新兴经济体”“转型经济体”等适用范围较宽泛的术语来指代中国（Wang et al., 2012; Yiu et al., 2007; Peng & Zhou, 2005），认为中国正从集权经济转型为自由经济，从非市场经济转型为市场经济，于是，把中国看作与巴西、印度、南非等国家或地区一样，正在向西方国家体制机制靠拢。

而后，西方学者发现，中国的制度情境与其他转型经济、新兴经济并不相同，难以用那些通用的名词来刻画，需要找到指向性更精确的术语。例如，有学者用“有

抱负的经济体”（aspirant economy）来形容中国那不逊于发达国家的经济与制度力量（Bruton et al., 2021）。“中国奇迹”对学术研究的直接辐射影响至少有二：首先，为当前主流管理理论或所谓“通用理论”的外部效度提供了新的检验环境（Filatotchev et al., 2021），毕竟无论是否真的“通用”，这些被部分学者奉为“金科玉律”的管理理论和概念至少在根源上受限于特定时空。如 20 世纪 60~80 年代日本的崛起，其制度情境与中国有天壤之别。那么，在 21 世纪的中国，这些被标榜具有普适性的管理理论是否能继续具备指导企业实践、解释管理问题的效力，需要整个学术社区共同寻找答案。其次，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领域取得的成就向管理学界抛出了若干亟待探索的重大命题，这些命题对管理研究的进步与完善至关重要，吸引了海内外学者尤其是华人学者的目光。2020 年是距离最早一批来自中国的学者于国际顶尖刊物取得论文突破的第三十年，而李家涛作为在国际高层次学术舞台讲述中国故事、中国智慧、中国理论的先行者之一，在这个具有象征意味的时间点对 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管理学者发表在国际主流期刊上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整体性回顾。进一步地，他尝试在自己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中国元素进行整合、提炼，让其从较为模糊的情境和抽象的概念走向更为具象、可用的概念甚至是变量，并就如何围绕中国元素构建新的本土理论，或补充发展旧的通用理论指明方向。本文将就李家涛教授这篇文章进行概括性评述，以凝练其核心思想与观点，并试图提出启发中国管理学者、对话西方学术权威的若干粗浅看法。

一、讲好中国故事，携手中国学者“走出去”

李家涛教授是最早一批出海求学的中国学者之一。他于 1985 年赴美国，七年后获得得克萨斯大学达拉斯分校管理学博士学位，毕业后留在美国从事学术研究，直到 1997 年返回中国香港，继续在香港科技大学任教。虽然在学术生涯的早期，他在与中国相隔了一个大洋的美国做研究，但这丝毫不妨碍他比大部分学者甚至是留在本土做学问的中国学者更贴近中国实际，始终处于解释“中国奇迹”的理论开拓前沿。这一评价并不是源于他读博时期展现出来的高水平文章写作和发表能力，而是源于对中国问题的浓烈兴趣、持续关注和学术责任。在他之前，中国一直被视为“学术戈壁”，来自这里的管理问题很难进入主流学者的研究视野，也难形成基于中国企业管理实践的学术研究团体，更无从谈起去构建有独特经验和独到智慧的中国管理理论学派。

那么李家涛是如何做到用好、写好、讲好中国故事的？从其学术作品看，我们认为需要具备两个必要条件。条件一，李家涛教授是为数不多的真正懂中国的中国学者。如今遍布全球的华人学者，特别是青年学者，不少发表成果往往只抓住了肤浅的表象，习惯性掺入自己的想象，甚至不惜“削足适履”，改造中国现实以迎合西方品味，而李家涛教授三十年来研究的对象和主题，从政治关联到政府摊派等（Li & Tang, 2010; Zhou et al., 2020），都是事关中国企业发展甚至存亡的真命题。条件二，李家涛教

授具有极高的学术纪律性,严格使用规范的研究工具和方法来论证、叙述和刻画对象,尤其擅长遵循实证主义进行定量研究,这使他想传达的中国故事首先在形式上就较早具备学术合法性。

不过,中国学者要想在国际管理学界建立自己的阵地并取得相当分量的话语权,绝不是有一两个模范人物在前方单打独斗就能实现的。李家涛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如他自己所言,合作构成了其整个学术生涯的重要一环。除了与海外著名学者保持密切的合作关系,他将更多精力用在集结和号召中国学者“走出去”,用今天时髦的话说就是“破圈”。别人把中国视为“学术戈壁”,那我们就硬要种出一片“绿洲”,而这一种就是30年——自1991年独自代表华人学者将成果发表在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上算起,李家涛已与40多名海内外华人学者成功将作品带到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等曾经鲜见中国学者身影的国际顶尖期刊上,其中有不少于10位有至少三次以上的合作^①。而这些作品中的大多数是根植于中国情境、脱胎于中国故事的。可以说,中国管理学界能够争取到今天这样还算有些许分量的话语权,必须感谢像李家涛教授这样敢于主动把责任和使命扛在肩上的优秀学者。

二、中国管理研究国际化, 我们走到了哪儿?

除了对自身求学与研究经历的详细叙述,

由点及面地刻画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管理学者在研究成果国际化方面做出的杰出贡献,李家涛教授在文中还对中国管理研究国际化全貌做了系统描绘。通过对六本国际顶尖管理期刊的追踪^②,作者识别了21位于1980~1999年在国际顶级期刊上发表成果的华人学者,他们总计贡献了47篇文章,其中绝大部分发表于90年代后半段,有明显加速的态势。从李家涛的总结来看,当时华人学者对中国管理问题的兴趣主要聚焦在认识对象和定义问题层面,虽然有零星的高水平学术产出,但基本属于向西方介绍我们所思考的“What”的问题,并没有尝试回答“Why”和“How”的解释性研究。在这个阶段,讨论最多的是改革开放背景下外资企业来华投资问题和市场转型情境下国企民企的改革与“松绑”问题,他们特别想要搞明白脱胎于计划经济的市场经济到底是什么样子,改革开放等政策究竟能否吸引到FDI,境外资本进来后又以什么样的形式存在,是否能全然按照西方资本主义那套制度,对于中国本土的合作伙伴又如何进行选择……这些研究话题无不鲜明地突出了彼时中国管理研究的整体进程和学者对中国管理问题的认知程度,至少在国际化发表层面。

如今,对中国情境下管理理论和实践的研究,成为全球管理学界重点关注的焦点之一。我们对全球最大的文献数据库Web of Science进行了粗略检索,按照“TS= ((China AND management) OR (China AND strategy*)) OR (China

① 资料来源:Scopus作者记录,合著作者统计参见<https://www.scopus.com/authid/detail.uri?authorId=8955324400>。

② 分别为:*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Organization Science*,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AND innovation*) OR (China AND organization*) OR (China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OR (China AND business*)) ” 的检索式，数据库设置为核心合集，研究方向设置为“Business Economics”，最终得到超过 66000 条检索结果，其中竟然有 65000 条出版于 2000 年之后。即使把时间窗口缩小至近五年（2016~2020 年），也依然有接近 33000 条，几乎为总数的一半。由此，一个显而易见的趋势呈现出来——中国管理研究的国际化进程在急剧加速，这与李家涛教授针对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国际顶尖管理杂志分析得到的结果保持一致，甚至更为激进。近年来许多主流管理期刊还以“特刊”的形式凝练和聚合中国管理问题，中国元素的影响力也可见一斑。

学术关注度快速提升带来的直接结果是研究视角的下沉。初步形成对中国独特制度情境的认识后，学者尝试进行解释性研究，借助西方主流管理研究的成熟理论与方法，对中国情境究竟如何影响企业战略制定与组织管理的过程和机制开展进一步研究。这个阶段，仅仅寻求建立两个或多个变量间联系的描述性研究已经“落后”了。但需要注意的是，可能由于采用了常见于西方情境中的研究工具，抑或受学术视野和研究水平的局限，当前的华人学术社群仍主要将目光聚焦在诸如投资并购、战略联盟、研发网络、国际商务等领域的传统命题。例如，部分华人学者关注国企或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国际化问题，试图探究国家所有制、隶属关系或高管政治经历等对企业跨国并购、OFDI、投资区位选择等国际化行为与绩效的影响（Bai et al. , 2021; Li et al. , 2017; Xia et al. , 2013;

Wang et al. , 2012)。

以上这些研究对中国管理理论研究具有不可磨灭的贡献，但也由于忽视对中国独特的本土命题和真实管理问题的提炼，要构筑起中国本土的理论和范式是非常困难的，因为难以走出“西方判断标准”。一个形象的比喻是，如今的中国学者已经站在了国际管理研究舞台的正中央，与西方学者一同分享聚光灯，但身上却仅披了件西服，缺了中国的内核。

三、从情境到理论，中国元素的独特性究竟如何刻画？

李家涛教授在文章中提到，在过去 30 年间，中国管理研究在对象、主题、情境、研究方法上呈现出日趋多元的特征。诚然，在规范的方法论指导下，中国学者对于套用普适的管理理论解释独特的中国问题以形成高水平的文章越发娴熟甚至精通，在 UTD-24 等国际一流期刊上的发表成绩也是一年比一年喜人。但是，一个最为根本的问题仍悬在我们头上，那就是中国情境或者“中国元素”（Chinese Elements）究竟是什么？如何结构化地刻画出来？又如何被用于补充和发展旧的管理理论，或被直接用于开发新的本土理论？尽管目前还没有准确的答案，但至少应该存在一个基本的共识——中国元素绝不等同于现阶段学者在文章引言或数据部分对中国作为研究情境的泛泛勾勒，也一定不是在给中国贴上所谓“有抱负的经济体”等时髦标签时所定义的几组简单特征。李家涛教授专门针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系统总结，站在

自己的学术成果基础上,从中宏观产业及区域和微观组织特征两个维度对中国元素进行了归类,这也与我们对中国管理问题的基本认知和一般分析框架保持一致。

(一) 规制、政策与资源配置

李家涛教授认为,定义中国元素的核心需回到制度层面,并将其解构为特殊的规制与政策、欠发达的制度基础设施、政府对资源配置的影响、区域异质性四部分。囿于篇幅限制,笔者主要对中国特殊的制度和政府对资源的配置权两方面进行评述和补充。

首先,中国政府在国家整体层面的制度设计和政策制定表现出显著的独特性。譬如,李家涛认为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以及后续跟进的一系列区域发展计划,的确吸引来了大量外资企业来华设立合资企业或绿地投资盘活当地经济(Li et al., 2015)。当合资和外资控股这两种常见于西方资本主义体制内的经济组织出现在受政府强力管控和频繁干预的中国市场上时,诸如高管派系冲突、不当市场竞争等问题也自然涌现出来(Li & Hambrick, 2005)。随着开放程度的加深,合资企业和部分外商全资子公司几乎完全摆脱了规制的束缚,放开手脚与本土企业开展竞争。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政府通过资源支持、主持或参与议价过程等方式,为本就“积弱”的本土企业提供保护,保持其与外资企业的竞争能力(Wei et al., 2020; Xia et al., 2013)。近年来,中国政府开始将战略目光投向海外,发起了“一带一路”等国际合作倡议,背后的核心逻辑依然是利用政府“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带动本土企业创新创业,而企业在开发新产品、新技术的过程中也

的确会在很大程度上从政府的这些创新政策中获益(Li et al., 2018),甚至出现一些“政策投机型”企业。

最近有学者开始提“新型举国体制”的概念,即在铁路、桥梁等我国屡创奇迹的领域内,都存在一个强有力的领导和执行机构,在国家力量的背书作用下,指挥经济主体并调动市场资源,激发和创造本不存在的产业创新能力(路风和何鹏宇, 2021),如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之于高铁(路风, 2019; 贺俊等, 2018)、中央专委之于“两弹一艇一星”(路风和何鹏宇, 2021)等。再比如,在中央政府和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有意设计下,铁路产业的型态由过去单纯服从行政指令的计划经济快速转向由供需关系决定的市场经济,形成“有控制的竞争关系”(贺俊等, 2018)。这些都是在中国这个复杂而独特的制度网络结构中,天然也是必然存在的管理现象和问题,饱含中国管理哲学的深厚智慧。

在中国,资源作为一种制度工具在塑造市场结构和驱动企业创新的过程中具有特殊作用。尽管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计划经济时期阻碍资源自由流动的制度藩篱,并将许多非核心却依然有价值的资源从公共系统中剥离,但转型期中国政府仍控制了土地、资金、技术等大量关键资源(魏江等, 2020a),能够直接影响甚至决定企业乃至整个产业的盛衰兴废。李家涛教授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在文中提到中国大型银行归国有,导致政府在借贷决策上拥有最终的“拍板权”。政府对核心资源的控制和分配还直接导致了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这不

仅可能引起国企内部的委托代理问题，更会加剧抑或扭曲国企与民企作为两大市场主体的竞争关系（Lazzarini et al., 2021; Zhou et al., 2017）。此外，政府尤其是具有“锦标赛”压力的地方政府可能因天然的垄断地位而形成对价值资源的“猎食性”。例如，李家涛发现政府可能根据所有者的社会地位来判断企业是否掌握有价值的资源，因为这些企业有可能通过“摊派”的形式进行侵占（Zhou et al., 2020）。因此，可以说资源同制度共同构成了政府调控宏观经济和影响企业行为的“组合拳”，使中国政府不像西方经济学理论所预测的那样仅仅发挥弥补市场失灵的干预职能，而是能够与市场并驾驱动经济。

这些年，越来越多的媒体指出，“全国上下一盘棋”的整体性政策框架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资源配置能力保障了经济持续发展，并认为这种体制在多个领域成功激发出创新，但也有声音认为，这种高效的制度免不了被贴上“集权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政府寻租”等常见于西方价值体系中的负面标签，导致中国企业在国际化发展中面临独特的来源国劣势（魏江等，2020b; Pant & Ramachandran, 2017）。例如，李家涛教授就注意到在“一带一路”倡议落地的过程中，一些政治性的考虑会降低中国企业的议价权，并增加东道国或第三国企业入围的可能（Li et al., 2021）。笔者研究团队也观察到类似现象的存在并展开研究，发现来源国劣势会使中国出海企业面临严重的外部“合法性赤字”，要解决这些赤字，就必须探索独特的海外研发网络结构（魏江等，2014）、海外子公司同构模式（魏江等，2016）等。

（二）国家所有权与政治关联

李家涛的研究，把中国元素在组织特征层面的映射归类为国家所有权、政治关联、本土企业弱知识基础和股权集中度四部分。这四个方面的特征是非常契合中国实际的，但国家所有权、政治关联更加凸显了中国企业面临的组织独特性。

李家涛在国家所有权层面的研究认为，中国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独树一帜，政府通过国资委间接控制的国有企业把控了国家经济的大动脉。尽管“国家资本主义”因其与自由资本主义相区别的制度逻辑而被学者广泛关注，但中国的国有企业还是构成了一种独特的、半政治半经济的组织形式，需要被单独考察。首先，国企被讨论最多的悖论在于对资源的获取和利用。一方面，国家所有权已被大量研究证明有益于企业获取关键的战略资源，且国家持股比例越高或所属政府级别越高，就越能依托所获得的关键战略资源实现持续竞争优势（Bai et al., 2021; Lazzarini et al., 2021; Li et al., 2018; Zhou et al., 2017）。另一方面，组织结构僵化、委托代理问题、制度逻辑不一致等内部原因，加之政府对国企的角色定位在于改善公共福祉而非单纯追求利益最大化，国企被发现并不能很好地利用这些资源，导致创新绩效普遍低于预期（Genin et al., 2021; Lazzarini et al., 2021）。因此，兼具制度力量和效率优势的混合所有制企业正逐渐重新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Bai et al., 2021）。李家涛还关注了国家所有权与 OFDI 的关系，认为国家所有权作为一种“负债”会拖累中国企业（Li et

al., 2019; Li et al., 2017)。当然,也有学者会得出截然相反的答案,认为与国家所有权相绑定的制度安排在很多情境下反而是中国企业国际化和创新追赶的“法宝”(Bai et al., 2021; Ramasamy et al., 2012)。Cuervo-Cazurra 和 Li (2020) 对此进行了系统总结,认为如果主要基于代理理论、资源依赖理论、新制度主义理论推演假设,得到的结论大概率是国家所有权并不利于企业开展 OFDI 活动;但如果借助经济发展理论、资源基础观和交易费用理论来推演,则可能发现国企在国际化过程享有的“福利”要远超由国家所有权带来的“负债”。

李家涛识别出中国企业组织特征的另一个因素是政治关联。尽管不同国家不同制度下都存在或紧或松的政治关联,但中国的政治制度和社交文化还是赋予政治关联以特殊意味。李家涛认为,政治关联作为一种制度资源具有“双刃剑效应”。一方面,政治关联能对 CEO 个人起到保护作用,在一定程度上防止来自政府的价值侵占(Zhou et al., 2020),能通过制度和财务资源支持(Wang et al., 2012)、深度的政策和海外投资信息供给(Li & Zhang, 2007)乃至外交站台(Cannizzaro & Weiner, 2018)等形式促进企业国际化和创新绩效。但另一方面,政治关联可能以职务委任(如企业高管被推选为两会代表)等形式成为政府向企业施加压力和控制的一种手段,反而成为 CEO 的负担,限制其决策自主权(Li & Tang, 2010)。显然,与政府保持密切联系需要支付巨额“对价”,包括满足政府的特定期望(Li et al., 2017),从制度逻辑角度去获得合法性等(Zhou et al., 2017)。

四、展望未来,中国学者应该去往哪里?

李家涛在文章的最后提出了三个极富洞察力和启迪性的倡议,呼吁中国学者:①关注中国企业的成长,看他们如何在庞大的消费市场、薄弱的技术体制等独特情境中实现产品、技术、流程以及商业模式创新。更为重要的是,学者要具备从这些中国管理智慧中汲取营养并反哺到指导企业创新实践的能力。②要努力尝试将中国元素整合入主流管理理论,为此需要中国学者形成和保持开展高水平研究的能力,并且在中国情境的独特性和学术范式的普适性之间寻求平衡。③要想获得更为广泛的国际认可,中国学者应该努力探寻能够让中国和非中国的社会均可受用的研究发现,打破“圈子”的民族边界,通过主办国际会议、鼓励联合发表、支持外国学者来华开展实地研究等形式,构建多元并包的学术社群。同时,研究还需要能够代表和传递有关学术严谨性与伦理性的最高标准,能够解决不断涌现的重大前沿命题。李家涛的这三个倡议十分清晰地指明了未来中国管理学界需着力的重点和突破的难点。那么,作为中国管理学者,我们应该如何从思想和行动上去响应李家涛的倡议?鉴于李家涛已身体力行地向我们示范了如何通过合作等形式加快中国管理研究“走出去”的探索,我们也就如何解构中国情境、开发本土理论等方面阐释和补充自己的理解。

(一) 具象化和结构化中国情境与元素刻不容缓

尽管现有研究成果在具象化和结构化中国

情境上有了长足进步，但如果把时间尺度拉长，放到整个管理学研究的历史进程中，那么中国管理研究才仅仅算是“亮相”，初步获得国际主流学界的合法性和注意力。要推动中国管理研究更进一步，让生长在他国异域的海外同行能够真正读懂中国故事、品析中国智慧，我们国内学者首先自己就要搞懂中国情境，不能仅仅停留在抽象的认识和粗糙的描述上面，要学会利用科学的方法去定义、解构以及具象地刻画这些中国元素。正如李家涛所说，大家都注意到了中国情境的特殊性，但究竟哪里特殊，这种特殊性又如何表征并影响企业战略与组织管理实践，一直缺乏明确的答案和系统的洞见。学者们只是笼统地勾勒了一个大致的轮廓，即中国是崛起的、巨型的、有抱负的新兴力量，但对于这幅画的细节未予呈现，有时仅仅是照猫画虎。例如，大量西方学者和华人学者习惯用“制度真空”（institutional voids）来形容中国的制度环境。从字面理解，“制度真空”指代的对象几乎没有制度可言，这显然是严重不符合事实的，即使作为比喻以突出制度不健全性，也是过于极端的（Cuervo - Cazurra et al. , 2019），因为中国是有独特且完整的制度体系的，不能因为与欧美不一样就认为制度缺失或者“不完美”（imperfect）。还有，学者们习惯于用政府对市场活动的强干预来表征中国制度的独特性，但站在国外读者角度，仅仅知道政府与市场之间存在强作用关系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政府干预市场”是个存在了将近半个世纪的一般共识，早已被“新凯恩斯主义”“北京共识”等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所解释。我们需要回答的是，中国的制度到底哪里不完善，

这种制度的不完善又如何表征在企业行为上，或者说，中国政府究竟通过何种方式干预市场，与西方经济学中的“干预主义”有何不同。

笔者长期受李家涛教授启发，从2010年前后开始关注中国独特情境的系统解构，提出了基于市场型态（market regime）、制度型态（institutional regime）及技术体制型态（technological regime）的MIT情境框架（魏江等，2020a）。市场型态层面，中国拥有“大市场”“巨型市场”，表面是巨大的体量和开发潜力，更深层而独特的特征还在于市场结构的两个悖论——不均衡悖论和动荡性悖论，前者表现为区域间和区域内的市场需求差异巨大，由此产生的错位需求为中国企业提供了宝贵的学习梯度空间；后者则表现在市场需求多变、市场机制不稳定和部分市场中上部“沦陷”等方面。但与西方理论所预言的不同，这些特征交织在一起时不仅不会构成一种“负债”，反而还会形成一条天然的“隔离带”，成为中国企业参与国际博弈的强大力量，对企业全球化和创新追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制度型态层面，不能仅仅停留在所有权、政治关联上，更要看到政府是最大的所有者、需求者和生产者，这种国家资本集权模式在转型经济时期是有独特效应的，比如，我们“制度型市场”的存在为企业创新追赶提供机会窗口（Wei et al. , 2020）。技术体制层面，尽管李家涛“客气”地说，今天许多中国企业已站在世界科技的最前沿。但笔者认为中国绝大部分产业和企业仍很落后，弱知识基础和技术体制仍将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存在。那么，我们需要学会借助这些特性，去制定具有中国智慧的创新政策和

产业政策。

（二）开发和完善中国本土管理理论适逢其时

李家涛在未来研究展望中提到，中国情境在过去极度缺乏合法性和关注度，导致学者不得不引用甚至生硬地套用西方主流理论以提高发表概率。但今天，中国情境已经在国际学术界攒聚了相当的合法性，并吸引了足够多的学术注意力，是时候该大胆地将中国元素整合入理论的构建过程中了。笔者也认为，李家涛对中国管理研究所处的阶段判断十分准确，非常赞同其提出的“形成拥有核心知识产权和独到思想内涵的理论体系”的倡议。形象地说，随着中国在学术以及学术之外的各个领域的影响力急剧提升，中国管理研究该是告别生搬硬套的“拿来主义”的时候了，中国学者尤其是青年学者也自然不应该再一味迎合西方评审人的偏好去做研究，更不应该凭空想象、改造现实（Marti & Gond, 2018），把原本深刻而有趣的本土故事硬生生改成徒有“中国”标签的浅显而枯燥的逸闻。相反，应该带着更具前瞻性和系统性的眼光审视源自中国管理实践的重大研究命题。何谓前瞻性和系统性的眼光？即超越短期的发表，看到十年、二十年之后的管理学术生态，使中国管理学界能凝心聚力，为国际学术社区贡献真知灼见，能够形成与西方平等对话的学术体系。

与所谓具有高度普适性的通用理论相对（Filatotchev et al., 2021），Van de Ven 等（2018）将本土研究定义为使用本土语言、本土对象、本土构念以及本着构建或检验能够解释本土现象的理論的目标开展的科学研究。根据

Eisenhardt（2021）对理论的定义，本土理论可以被理解为由过程机制等学术观点支撑的，用于解释某一具体现象的一组相互关联的本土构念，其实质是描述和解释本土事件的过程及其内在因果逻辑的故事。从中国管理实践看，是否必要以及如何去构建系列本土理论值得我们探讨。我们认为，只要扎根真实的中国管理现象，从中提炼出真问题、真观点，并在系统科学的方法指导下开发逻辑贯通的本土构念（Eisenhardt, 2021），辅以修辞性和深入对象内部结构的叙述（Pentland, 1999），应该有可能形成具有较高内部信度和效度的理论体系。中国学者不应该对本土理论创新缺乏自信，更不要担心所开发出的理论不被外界认可和采用。实际上，目前国际通用的主流管理理论（如代理理论、资源基础观等），其在形成之初也是因不具备外部效度而饱受质疑的本土理论，甚至即使到后来被整个管理学界所广泛使用，也依然无法解释远离其发源地的管理现象，因为这些理论背后的基本假设和边界条件是动态变化的（Bruton et al., 2021; Zahra et al., 2014）。因此，高度内嵌于中国独特情境的本土理论涌现，不仅不会造成分裂，还会给源于复杂现象的重大管理问题提供新的、互补的、有益于促进学术争鸣的解释。

接受编辑：Haiyang Li

收稿日期：2021年10月28日

接受日期：2021年12月17日

作者简介：

魏江，博士，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创新与战

略管理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现任浙江大学管理学院院长、浙江大学全球浙商研究院院长、浙江大学中国科教战略研究院副院长等职务。研究方向包括中国企业创新战略、数字创新等。出版的著作包括《创新全球化：中国企业的跨越（案例辑）》和《非对称创新战略：中国企业的跨越（理论辑）》等，提出了“非对称创新”理论。

陈光沛，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浙江大学中国科教战略研究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非对称创新背景下国有企业创新体制机制等。曾在《科学学研究》《外国经济与管理》等期刊发表论文，并有案例入选第十二届“全国百篇优秀管理案例”（重点案例）。

参考文献

- [1] 贺俊、吕铁、黄阳华、江鸿：《技术赶超的激励结构与能力积累：中国高铁经验及其政策启示》，《管理世界》，2018年第10期。
- [2] 路风、何鹏宇：《举国体制与重大突破——以特殊机构执行和完成重大任务的历史经验及启示》，《管理世界》，2021年第7期。
- [3] 路风：《冲破迷雾——揭开中国高铁技术进步之源》，《管理世界》，2019年第9期。
- [4] 魏江、黄学、刘洋：《基于组织模块化与技术模块化“同构/异构”协同的跨边界研发网络架构》，《中国工业经济》，2014年第4期。
- [5] 魏江、王丁、刘洋：《来源国劣势与合法化战略——新兴经济企业跨国并购的案例研究》，《管理世界》，2020年第3期（a）。
- [6] 魏江、王丁、刘洋：《非对称创新：中国企业的创新追赶之路》，《管理学季刊》，2020年第2期（b）。
- [7] 魏江、王诗翔、杨洋：《向谁同构？中国跨国企业海外子公司对制度双元的响应》，《管理世界》，2016年第10期。
- [8] Bai, T., Chen, S., & Xu, Y. 2021. Formal and informal influences of the state on OFDI of hybrid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n China.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30: 101864.
- [9] Bruton, G. D., Ahlstrom, D., & Chen, J. 2019. China has emerged as an aspirant economy.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 38: 1-15.
- [10] Bruton, G. D., Zahra, S. A., Van de Ven, A. H., & Hitt, M. A. 2021. Indigenous theory uses, abuses, and future.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https://doi.org/10.1111/joms.12755>.
- [11] Cannizzaro, A. P., & Weiner, R. J. 2018. State ownership and transparency i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49: 172-195.
- [12] Cuervo-Cazurra, A., & Li, Cheng. 2020. State ownership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The advantage and disadvantage of stateness.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56: 101112.
- [13] Cuervo-Cazurra, A., Mudambi, R., & Pedersen, T. 2019. Clarifying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institutions and global strategy. *Global Strategy Journal*, 9: 151-175.
- [14] Eisenhardt, K. M. 2021. What is the Eisenhardt Method, really? . *Strategic Organization*, 19: 147-160.
- [15] Filatotchev, I., Ireland, R. D., & Stahl, G. K. 2021. Contextualizing management research: An open systems perspective.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https://doi.org/10.1111/joms.12754>.
- [16] Genin, A. L., Tan, J., & Song, J. 2021. State governance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emerging

economies: State-owned enterprise restructuration and institutional logic dissonance in China's high-speed train sector.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52: 621-645.

[17] Lazzarini, S. G., Mesquita, L. F., Monteiro, F., & Musacchio, A. 2021. Leviathan as an inventor: An extended agency model of state-owned versus private firm invention in emerging and developed economie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52: 560-594.

[18] Li, H., & Zhang, Y. 2007. The role of managers' political networking and functional experience in new venture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China's transition economy.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8: 791-804.

[19] Li, J., & Guisinger, S. 1991. Comparative business failures of foreign-controlled firms in the United State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2 (2): 209-224.

[20] Li, J., & Guisinger, S. 1992. The globalization of service multinationals in the "triad" regions: Japan, Western Europe and North Americ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3 (4): 675-696.

[21] Li, J., & Hambrick, D. C. 2005. Factional groups: A new vantage on demographic faultlines, conflict, and disintegration in work teams.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48: 794-813.

[22] Li, J., Li, P., & Wang, B. 2019. The liability of opacity: State ownership and the likelihood of deal completion in international acquisitions by Chinese firms.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40: 303-327.

[23] Li, J., Qian, C., & Yao, F. K. 2015. Confidence in learning: Inter-and intra-organizational learning in foreign market entry decisions.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36: 918-929.

[24] Li, J., & Tang, Y. 2010. CEO hubris and firm risk taking in China: The moderating role of managerial dis-

cretion.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53: 45-68.

[25] Li, J., Van Assche, A., Li, L., & Qian, G. 2021.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A political economy perspectiv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https://doi.org/10.1057/s41267-021-00435-0>.

[26] Li, J., Xia, J., & Lin, Z. 2017. Cross-border acquisitions by state-owned firms: How do legitimacy concerns affect the completion and duration of their acquisitions? .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38: 1915-1934.

[27] Li, J., Xia, J., & Zajac, E. J. 2018. On the duality of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takeholder influence on firm innovation performance: Theory and evidence from Chinese firm.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39: 193-216.

[28] Marti, E., & Gond, J. 2018. When do theories become self-fulfilling? Exploring the boundary conditions of performativity.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43: 487-508.

[29] Pant, A., & Ramachandran, J. 2017. Navigating identity duality in multinational subsidiaries: A paradox lens on identity claims at Hindustan Unilever 1959-2015.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48: 664-692.

[30] Peng, M. W., & Zhou, J. Q. 2005. How network strategies and institutional transitions evolve in Asia.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 22: 321-336.

[31] Pentland, B. T. 1999. Building process theory with narrative: From description to explanation.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4: 711-724.

[32] Ramasamy, B., Yeung, M., & Laforet, S. 2012. China's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Location choice and firm ownership.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47: 17-25.

[33] Van de Ven, A. H., Meyer, A. D., & Jing, R. T. 2018.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of engaged indige-

nous scholarship.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 14: 449-462.

[34] Wang, C. , Hong, J. , Kafouros, M. , & Wright, M. 2012. Exploring 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volvement in outward FDI from emerging economie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43: 655-676.

[35] Wei, J. , Sun, C. , Wang, Q. , & Pan, Q. 2020. The critical role of the institution-led market in the technological catch-up of emerging market enterprises: Evidence from Chinese enterprises. *R&D Management*, 50: 478-493.

[36] Xia, J. , Ma, X. , Lu, J. W. , & Yiu, D. W. 2013.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by emerging market firms: A resource dependence logic.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35: 1343-1363.

[37] Yiu, D. W. , Lau, C. M. , & Bruton, G. D.

2007. International venturing by emerging economy firms: The effects of firm capabilities, home country networks, and corporate entrepreneurship.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38: 519-540.

[38] Zahra, S. A. , Wright, M. , & Abdelgawad, S. G. 2014. Contextualization and the advancement of entrepreneurship research. *International Small Business Journal*, 32: 479-500.

[39] Zhou, K. Z. , Gao, G. Y. , & Zhao, H. 2017. State ownership and firm innovation in China: An integrated view of institutional and efficiency logics.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62: 375-404.

[40] Zhou, J. , Ge L. G. , Li, J. , & Chandrashekar, S. P. 2020. Entrepreneurs'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government expropriation in an emerging economy. *Strategic Entrepreneurship Journal*, 14: 396-418.

The Chinese Elements in Management Research: From Contexts to Theories

—A Commentary on “Reflections on Chinese Management Research” by JT Li

Jiang Wei¹ Guangpei Chen²

(1. School of Management, Zhejiang University;

2. Institute of China's Science, Technology and Education Policy, Zhejiang University)

Abstract: At a time that marks the 30th anniversary of publications in top-tier management journals by scholars originally from China's mainland, Professor Jiatao Li, a distinguished scholar in strategic management, shared his thoughts on Chinese management research community. After carefully reading his work of reflections,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Chinese management research must strive to contribute knowledge and insights that embody real Chinese experience and oriental wisdom to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by specifying and structuring Chinese contexts as well as elements, and developing Chinese indigenous theories. This commentary proposes that, many arguments and propositions put forward by Li, if answered properly, will help to enhance the voice of Chinese scholars in the mainstream communities,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al science. Furthermore, this paper also extends a research framework centering on Chinese elements and some academic initiatives proposed by Professor Li.

Key Words: Chinese context; indigenous theory; institution; catch-up in innovation